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十周年館慶同人論文集

敦煌學卷



顧問／饒宗頤 李焯芬

主編／鄭焯明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
廿四年國際社會論文展

社會學卷



劉麗、陳國強、李國強

2004-2005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十周年館慶同人論文集
敦煌學卷

顧問／饒宗頤 李焯芬

主編／鄭焯明

編委會成員／鄭焯明 陳德好 羅慧 孫沁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十周年館慶同人論文集·敦煌學卷 / 鄭煒明主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325-7003-4

I. ①香… II. ①鄭… III. ①敦煌學—文集 IV. ①K870.6-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14775 號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十周年
館慶同人論文集—敦煌學卷

鄭煒明 主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635 × 965 1/16 印張 28.25 插頁 2 字數 354,000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50

ISBN 978-7-5325-7003-4

K · 1776 定價: 9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總 序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於 2003 年 9 月開始運作，至 2013 年的秋天，已滿十周年了。時間過得真的很快，由剛開始時連我在內的四位同事，發展到今天的共十六七位全職或兼職的同人，另還有十餘位名譽研究員，規模明顯大了不少。但一切都恍如昨日。

十年如一日，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秉承饒先生的志向，一直把他所提倡的華學的學術研究，作為工作重點之一。十年來，一群年輕而有活力的青年學者，在學術部主任鄭煒明博士帶領下，孜孜不倦地在好幾個領域努力不懈地學習和研究，也總算做了一點點成績出來。現在呈獻的這一套“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十周年館慶同人論文集”，分敦煌學卷、琴學卷和饒學卷三種，收錄（去除了重見的）論文共四十餘篇，展現了學術館的部分成果。這三部論文集約有兩個特點：一、論文的選題都比較新，並非老生常談的題目，具見一群年輕人有著努力鑽研學問，開辟新領域的學術進取心；二、論文的作者除了鄭煒明博士外，都比較年輕，有七零後的和八零後的，都可算是學界新人，這也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學術和文化正需要一代代的傳承。

當然，學術館同人在過去十年曾耕耘過的學術領域，不止這三部論文集的範圍。他們的個人項目中還包括考古學、人類學、詞學、文獻學、歷史學等等方面的課題，都有一些可觀的成果。饒先生一直非常鼓勵學者要具備跨領域、跨文化的學術能力和表現，而學術館的同人在這方面都很有潛力，這三部論文集就是一個小小的證明。（也因為這個緣故，三集之中有小部分重見的論文，這是要說明的。）

總之，我對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的同人，充滿信心；謹祝願大家在新的十年更進一步，在學術上有更多的建樹，而學術館也因此而發展得更好。

是為序。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

李焯芬

編者前言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出版《敦煌學論文集》，意義有四。敦煌學早為饒宗頤教授學藝雙攜的重要橋梁，他的《敦煌曲》、《敦煌白畫》及《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等籍，曾一度影響歐洲的敦煌學研究。學術館作為饒學及香港敦煌學的主要研究中心，出版論文集可謂名正言順。首篇即為饒教授的《敦煌學應擴大研究範圍》，對未來敦煌學的發展實起啟導作用。

本書另一特色，乃集中所載悉為學術部同人論文，其中何廣棧及王炳華教授，更為本館名譽顧問。集內論文，內容五花八門，既有考古、洞窟及遺址等考察，又有變文、樂名以至中外敦煌學家的評說；既有原創論文，又有翻譯作品；既有新知，又有經典，中西並蓄。因此，出版本論文集，不論對香港敦煌學界，還是學術館本身，皆有特殊的意義。

1992年，饒宗頤教授得到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及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梁秉中院長支持，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成立“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十年間不斷邀請內地學者蒞港參與研究工作。2007年後，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由新亞書院遷往香港大學

饒宗頤學術館，好讓研究人員繼續敦煌學的整理研究工作。本書即搬遷後第一種敦煌學文集，它標誌著本館的敦煌學研究正式啓動。

2013年，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爲開館十周年誌慶，適逢文集出版，既可作爲館慶賀禮，又爲香港敦煌學研究啓航，可謂錦上添花，雙得益彰。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二〇一三年十月

目 录

總序 /1

編者前言 /1

敦煌學應擴大研究範圍 饒宗頤 /1

中國西北宗山水畫說 饒宗頤 /8

蘇瑩輝教授及其敦煌學論著目錄編年 何廣棧 /17

從新疆考古看絲綢之路的開拓、變化、奉獻 王炳華 /55

居盧訾倉故址研究 王炳華 /159

明代敦煌地區佛教寺院建置史考略 鄭煒明 余穎欣 /193

敦煌莫高窟壁畫中的古琴圖像研究 鄭煒明 陳德好 /228

孫楷第先生的敦煌學研究 龔 敏 /256

敦煌藏文寫卷《聖大黑天女陀羅尼》初探 黃杰華 /272

饒宗頤教授的敦煌文學研究 黃杰華 /281

饒宗頤教授與藏學研究 黃杰華 /319

略論亞瑟·韋利之敦煌研究 羅 慧 /352

饒宗頤教授與香港敦煌吐魯蕃研究中心 羅 慧 /388

附錄

丹青不老

——選堂先生九五華誕紀事 李焯芬 /410

記饒宗頤先生九五華誕研討會

——兼略述饒氏敦煌學成就 鄭煒明 /414

當禪與密宗相遇：藏族在敦煌的融和

森・范・薩克 雅各・德爾頓 /421

編後記 /439

作者簡介 /442

敦煌學應擴大研究範圍

饒宗頤教授口述、鄭煒明博士整理

《敦煌吐魯番研究》編輯部主任郝春文教授來函，要我為該刊第九卷（創刊十周年紀念專號）寫點東西。我雖忝為該刊主編之一，其實不過是敦煌學研究的先頭部隊中的過河卒子之一，諸種錯愛和過譽，愧不敢當。本來沒有什麼要說，但這次看來是推辭不了，祇好以這篇小文章來搪塞，倒也代表了我對敦煌學發展的一些期望。

自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敦煌學的發展，已成為一門全世界都關注的學問，而其重心在中國，這一點，我感到非常安慰。

但對於敦煌學的研究現況，我還是有點意見的。我認為敦煌和敦煌學都應從廣義來看。

從廣義看敦煌，則關注點不祇局限於敦煌的石窟；石窟週圍各地方的歷史、地理、曾經出現過的民族及其文化傳承演變等等皆應為關注點。假如祇是石窟的話，那麼所研究的祇是石窟的內容，包括佛像等的圖像學和有關的經卷的研究而已。

從廣義看敦煌學的話，則敦煌學的研究應包括各個時期的敦煌

和各種可供研究的素材中的敦煌。我認為敦煌的重要歷史，最少可分為三個時期。一、早期：指匈奴歸義之前後，設立河西四郡之前，一直到晉十六國為止的這個時期。二、前期：指十六國之後，到盛唐，至安史之亂這個時期。三、後期：指吐番佔領後，歷五代，至北宋這個時期。（當然，北宋之後的敦煌也可以研究。）我這個分期法，主要考慮的是敦煌在這幾個時期都有着其截然不同的社會環境的改變。另從各種可供研究的素材這個角度看，目前敦煌學界祇注重以敦煌經卷和敦煌石窟的圖像史料為主要的研究對象，這是有缺憾的。我認為還應十分注重竹、木簡方面的材料。現在已陸續出土了巨量的兩漢、魏晉的與敦煌有關的簡，剛好可供研究早期敦煌的歷史和文化，目前這個時期的研究，包括敦煌簡方面的研究，尚未深入，正有待開展。我的主張是首先要敦煌學界把早期敦煌（匈奴時期的敦煌）和與敦煌有關的兩漢、魏晉簡納入廣義的敦煌學之範圍內，這樣就可能開創一個新的局面。

下面我祇舉一個例子，以說明和支持我上面的提議。

近年敦煌學界頗為關注粟特文化與敦煌的牽涉，研究祆教的學者更力指敦煌的宗教並非佛教，乃與祆教有深切關聯；其實敦煌宗教乃混合體。敦煌這個地方，本屬於匈奴，因此早就種下了混合因素。但我這回主要想談一談昭武九姓的問題。

吉田豐（Yutaka Yoshida）教授在 2003 年的 *Journal Asiatique* 第 291 卷 1—2 期上發表了一篇重要的論文“On the Origin of the Sogdian Surname *Zhaowu* 昭武 and Related Problems”，這是一篇討論昭武九姓起源問題的論文。他引蒲立本教授（E. G. Pulleyblank）的說法，指昭武之名最早見於《隋書》，而有關昭武的史料乃屬隋代或初唐時期而已；他們並以《北史》、《魏書》等有關康國及昭武九姓的記載皆與《隋書》相同為理由，認為前兩者乃抄襲後者而成的，於是將昭武九姓起源定於隋代或唐初（見該刊 36—37 頁）。余太山

先生在其《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①中的《〈魏書·西域傳〉原文考》裏亦認為《魏書·康國傳》乃“後人”據《隋書》“妄改”，時間座標應為隋的大業中（見該書90—91頁）。

不過，他們似乎都忽略了敦煌懸泉出土漢簡方面的資料，將漢晉資料全然不顧，令人費解。這批1990年起至1992年止在今敦煌甜水井東南三公里的漢代懸泉置遺址中出土的二萬三千餘枚有字簡牘中，就有非常明確的昭武史料，已經提到昭武。

敦煌懸泉簡中有一枚被稱為敦煌懸泉里程簡的，其中一些內容如下：

……小張掖去姑臧六十七里，姑臧去顯美七十五里……氏池去鱣得五十四里，鱣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昭武去祁連置六十一里，祁連置去表是七十里。^②

案此簡“氏”字原文下部從“土”字，可互通。此昭武顯然是《漢書·地理志》（南宋福唐郡庠重刊，北宋淳化監本）的張掖郡下十縣之一的昭武；十縣依次是鱣得、昭武、刪丹、氏池、屋蘭、日（曰）勒、驪軒、番和、居延、顯美。《後漢書·郡國志五》張掖郡下記載：“八城，戶六千五百五十二，口二萬六千四十：鱣得、昭武、刪丹（弱水出）、氏池、屋蘭、日勒、驪軒、番和。”^③由此足證漢時昭武已屬張掖郡之十縣或八城之一。又請參看拙與李均明合著的《敦煌漢簡編年考證》漢宣帝（上）第三附三第（二九）條、新莽（上）第十第（三三三）與（三三四）兩條等資料及其解釋，可為上面所

① 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② 見胡平生、張德芳編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0號簡，頁56。

③ 南宋福唐郡庠重刊，北宋淳化監本。以下《後漢書》均為此版本。

說及的佐證^①。

張掖郡所轄諸縣，如鱣得名出於匈奴，氐池爲氐人所曾居，驪軒當是大秦人貿易足跡所至而聚居，甘肅武威拙台漢墓有“琥珀獸”5件，可爲物證。^②

《後漢書·梁慄傳》昭武此一地名之下，有唐章懷太子李賢注云：“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西北也。”

又據同傳所載：“（永初）二年春，還至敦煌。會衆羌反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僅至張掖、日勒……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虜遂散走……及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僅降……河西四郡復安。”張掖、日勒地名之下，有唐章懷太子李賢注云：“日勒，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西北也。”可證唐章懷太子李賢已知後漢時已有日勒、昭武等位於張掖西北之地名。

昭武乃張掖郡屬縣，其故城在今臨澤縣東北十五公里的昭武村，而祁連置當在今臨澤縣和高臺交界處。^③

據《晉書斟注》卷十四下張掖郡條下有臨澤，謂乃“漢昭武縣，避景帝諱改也”，故知晉及以後的臨澤即漢之昭武縣；王先謙《後漢書集解》之志二十三上張掖郡昭武條亦已提到“《晉志》改曰臨澤；《一統志》：故城今張掖縣西北”。

另簡文中其他地名如姑臧、顯美、氐池、鱣得等，皆可與《漢書》、《後漢書》等先於隋唐的史籍互證；同時，既與《隋書·康國傳》、^④《北史·康國傳》、^⑤《魏書·康國傳》；^⑥案據二十五史編刊館仁壽本影印本之列傳第九十之末頁云，魏收書《西域傳》已亡佚，

①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年，頁18—21，頁106—108。

② 參《考古學報》1974年2期，頁87—109；另可參門人許曉東2005年在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的關於琥珀的博士論文第五章。

③ 參考《敦煌懸泉漢簡釋粹》，頁58，注6、7。

④ 元饒州路學刊本。

⑤ 元信州路學刊本。

⑥ 南宋紹興間江南重刊北宋監本。

此卷全抄《北史·西域傳》等所載之“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與懸泉簡稱“昭武去祁連置六十一里”的地理正相符；也與《後漢書》中唐章懷太子李賢所注之地望亦相吻合。

祁連置即祁連山；余太山認為漢代的祁連指今之天山，^①然其說並不可靠，據此簡即證明不是天山。

因此可以說，有關昭武及昭武九姓起源問題的資料，現在理應追溯到敦煌的懸泉漢簡；依舊恪守《隋書·康國傳》的說法而將昭武及昭武九姓起源定為隋或初唐則似乎是太保守了一點。而敦煌懸泉漢簡的重要性，亦由此可見一斑。

我相信敦煌在漢以前的匈奴時期，即在河西四郡未成立之前，應有許多大秦人於此貿易，他們开辟了匈奴時期的敦煌。今天的敦煌學界，應趁這時候展開匈奴時期的敦煌及其與外國（族）來往的實際情況的深入研究了。而衆多與敦煌有關的兩漢魏晉簡和其他漢晉資料，正好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我們千萬不要把就放在眼前的珍貴資料，輕輕地忽略過去。

關於隋唐之前敦煌一帶之衆多西域民族與中國或和或戰、時降時叛之關係，《晉書》中亦頗多重要資料，值得留意。今舉《晉書·武帝紀》和《晉書·惠帝紀》中若干條為例，以備研究者參考：

1. 《晉書·武帝紀》：“（泰始三年）夏四月戊午，張掖太守焦勝上言，氐池縣大柳谷口有玄石一所，白畫成文，實大晉之休祥，圖之以獻。詔以制幣告于太廟，藏之天府。”^②

可見氐池之地名已載於隋唐之前的正史，其地必在張掖附近，甚或向來是歸張掖郡管轄的。

2. 《晉書·武帝紀》：“（咸寧二年秋七月）鮮卑阿羅多等寇邊，

① 參考《塞種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53—56。

② 據中研院網上新校本。以下《晉書》均為此版本。

西域戊己校尉馬循討之，斬首四千餘級，獲生九千餘人，於是來降。”

可證魏晉時西域有鮮卑族。

3.《晉書·武帝紀》：“（咸寧三年）是歲，西北雜虜及鮮卑、匈奴、五溪蠻夷、東夷三國前後十餘輩，（案宋本作‘十’，他本作‘千’）各帥種人部落內附。”

據此條，可見當時西域有衆多民族，所謂“西北雜虜及鮮卑、匈奴”是也。

4.《晉書·武帝紀》：“（咸寧四年六月）涼州刺史楊欣與虜若羅拔能等戰于武威，敗績，死之。”

5.《晉書·武帝紀》：“（咸寧）五年春正月，虜帥樹機能攻陷涼州。乙丑，使討虜護軍武威太守馬隆擊之。”

6.《晉書·武帝紀》：“（咸寧五年）冬十月戊寅，匈奴餘渠都督獨雍等帥部落歸化。”

7.《晉書·武帝紀》：“（太康六年冬十月）龜茲、焉耆國遣子入侍。”

8.《晉書·武帝紀》：“（太康八年十二月）南夷扶南、西域康居國各遣使來獻。”

可見晉初西域仍有康居國。

9.《晉書·惠帝紀》：“（永平六年五月）匈奴郝散弟度元帥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張損死之。……秋八月，雍州刺史解系又爲度元所破。秦雍氏、羌悉叛，推氏帥齊萬年僭號稱帝，圍涇陽。”

案此條可與《文選》之潘岳《馬汧督誄》互參。至於“秦雍氏、羌悉叛，推氏帥齊萬年僭號稱帝”，則足證自漢以來一直至魏晉，當時在西域的氏人和羌人，勢力頗大；可與本文上引之《後漢書·梁懂傳》內所記載的有關梁懂在敦煌一帶與羌人多次戰鬥的史實互相

參證。另據《敦煌懸泉漢簡釋粹》，其中就有 55 枚簡牘，涉及漢代敦煌一帶的羌族各種活動，詳細情況可參考初世賓著《懸泉漢簡羌人資料補述》。^①

我過去多年來一直主持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該中心的一個核心工作為其研究叢刊中的《補資治通鑑史料長編稿系列》，至今已出版了近十種著作。其中大部分著作如我與李均明二人合著的《新莽簡輯證》（1995 年）和《敦煌漢簡編年考證》（1995 年）、由我主編。由王素著的《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1997 年）、王素和李方合著的《魏晉南北朝敦煌文獻編年》（1997 年）、王輝著的《秦出土文獻編年》（2000 年）、劉昭瑞著的《漢魏石刻文字繫年》（2001 年）、陳國燦著的《吐魯番出土唐代文獻編年》（2003 年）、李均明著的《居延漢簡編年——居延編》（2004 年）等等，其實反映了我的有關敦煌學研究的一貫的主張：

1. 敦煌學要突破以研究隋唐為主要的時代座標的局限，所以我的關注點是：由秦代到魏晉南北朝都有仔細研討的必要。

2. 敦煌學也要突破以經卷文獻和石窟圖像為主要的研究材料或物質對象的局限，所以我提倡研究簡牘和石刻史料等等。

而上述兩點更應該結合起來。這些方面的工作，正等待着許許多多人的投入。這就是我對於廣義敦煌學的期望。

（原刊於《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九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① 見《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頁 167—189。